

宋代雅乐研究综论

陈宗花

【摘要】国内宋代雅乐研究始自民国之初,20世纪10-60年代的研究成果开辟了国内宋代雅乐研究的基本路径与方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运动又启动了宋代雅乐的复原探索,历史研究工作与复原实践探索开始齐头并进。宋代雅乐研究在雅乐历史研究、雅乐形态研究、雅乐复原综合研究等三个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都取得了突出成绩:在历史研究领域,重视系统的历史文献整理与精细考辨,强调历史演进、艺术社会功能、文化交流的多维审视;在形态研究领域,立足于严格的实证研究,充分重视考古发现,并吸收现代考古学、声学、音律学等科学成果,在乐器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在复原综合研究领域,基于对大晟钟的科学研究,在复原研究和复原实践方面成绩显著。百年宋代雅乐研究形成了历史研究与复原实践探索紧密结合、二重证据法运用、充分吸纳科学成果与技术手段等特点。

【关键词】宋代雅乐;雅乐历史;雅乐形态;雅乐乐器;雅乐复原

【作者简介】陈宗花(1975-),女,河南信阳人,艺术学博士,河南大学艺术学理论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代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河南省特聘教授(河南 开封 475001)。

【原文出处】《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开封),2020.6.54~6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大众化、民族形式探索与革命音乐形态的生成”(16BD049)阶段性成果;河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培育计划“中国共产党音乐传统继承与新时代音乐的创新”(2019ZDXM020)阶段性成果。

国内宋代雅乐研究始自民国之初,在20世纪10-60年代一些研究成果陆续出现,而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宋代雅乐再度引起国内中国古代音乐史、古代文化史、宋史研究领域的重视,尤其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热潮的兴起,音乐史家与音乐理论家们复原宋代雅乐的热情得到激发,学者们积极探索并尝试将学术成果转化为活态音乐文化,自此在宋代雅乐研究领域,严格的历史研究与复原探索齐头并进,并紧密结合。不过,迄今为止,国内对于宋代雅乐研究的综合性考察尚未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已历百年的宋代雅乐研究的发展历程较为特殊,研究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但这40年来研究活动的蓬勃发展完全是建立在20世纪10-60年代少量的研究成

果基础之上,甚至研究的基本路径与方向都是在开创时期就大体确定下来的;同时,复原雅乐等传统音乐文化形态本来也正是这些学界前辈投身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初心。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内学者遵循前辈所开创的研究路径与方法等,在宋代雅乐的历史研究、雅乐的形态研究、雅乐的复原综合研究等三个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都取得了突出成就。笔者拟从此三方面入手,全面梳理与考察国内宋代雅乐研究及复原研究的理论、实践探索成果,以求总体概括国内宋代雅乐研究的基本方向及特点等,希望借此进一步推进该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一、宋代雅乐历史研究

20世纪以来的国内宋代雅乐研究始于整理与研究雅乐历史文献,而且最初只是被一些史家作为中国音乐全史研究的一个较小问题来看待。笔者将20

世纪10—60年代作为宋代雅乐研究的开创期。早期史家力图借鉴近代西方的音乐学观念和研究范式,对包括宋代雅乐在内的中国古代音乐现象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其开创性研究活动奠定了宋代雅乐历史研究的基础,并开拓出研究的基本路径,同时确立了宋代雅乐历史研究的基本思维范式与研究方法论。开创期代表性成果包括萧友梅1916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系用德文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①、王光祈1931年在德国编写完成的《中国音乐史》^②、许之衡1935年出版的《中国音乐小史》^③,以及杨荫浏1962年完成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④等。萧友梅、王光祈、许之衡的研究开展较早,他们从近代西方音乐学观念与研究范式出发,初步分类整理了宋代雅乐相关历史文献并尝试梳理概括,虽具开创之功,但较简略粗疏。直到20世纪60年代,杨荫浏结合以往音乐史研究成果,戛戛独造,使其宋代雅乐研究成为前数十年成果的集大成之作。他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十七章《宫廷的雅乐》中集中研究宋代宫廷雅乐,不仅进行了系统文献梳理与概括总结,尤其突出的是,尝试用一以贯之的音乐史观通观历史,并揭示历史规律;当然其史论观念偏重阶级分析,有些断论仍需斟酌。以上研究的另一个共同特点在于,他们注重从中国音乐发展演进角度考量宋代雅乐等各时代音乐现象的意义和价值。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与宋代雅乐相关的译介成果,如1962年翻译出版的日本林谦三的厚重之作《东亚乐器考》^⑤与朝鲜文河渊、文钟祥的《朝鲜音乐》^⑥,均涉及对宋代雅乐海外流布的研究。此后,宋代雅乐历史研究沿着前辈学者开创的道路,遵循其研究思路与方法,在雅乐历史发展、雅乐与东亚文化圈雅乐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着更全面细致并更为专门化的深入研究。

关于宋代雅乐历史发展的研究,包括对雅乐历史文献,发展脉络,音乐制度、形制等的综合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的宋代雅乐研究均继承开创期传

统,将对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作为最根本的基石,而且整理、研究工作较之开创期更为系统全面。当然,也有学者集中进行文献整理研究,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李方元的《〈宋史·乐志〉研究》,该著全面综合整理研究了宋代雅乐最重要历史文献《宋史·乐志》。^⑦《宋史·乐志》较完备地记录了宋代宫廷音乐制度,涉及各个方面。李方元从乐舞、乐章、乐悬、乐器、乐仪、音乐机构、乐工、音律、宫调、乐调名和征引文献等方面对《宋史·乐志》进行了全面梳理与归纳。他还细致分析考察了《宋史·乐志》的编撰过程、史料来源、基本特质,以及雅乐史观、音乐观等,指出《宋史·乐志》与以往史书乐志的重大区别在于更注重记载不同时期音律和雅乐实践等的变化,并揭示出这种变化的产生是缘于雅乐的音乐性问题在宋代得到重新认识。此外,杨成秀系统梳理了北宋雅乐乐论文献,^⑧并与李方元、康瑞军合作分类整理《宋代乐论》^⑨。卫亚浩对乐府各机构设置的相关历史文献的整理成绩突出。^⑩

厘清宋代雅乐的历史发展历程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宋代雅乐的发生与演进脉络成为考察重点。在发生学研究方面,王小盾等溯源至后周,指出周世宗依照乐工教习、乐书编制、乐制考订、定律制器、依调制曲的顺序建设雅乐,扭转了晚唐以来礼崩乐坏局面,为宋代雅乐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模板。^⑪郑月平则立足时代文化背景,指出北宋雅乐复兴的初旨是为重振“雅正之音”。^⑫宋代雅乐历史演进受到更多关注,这方面集中于雅乐复兴、雅乐改革问题,研究者既关注到逐渐浓厚的宋代雅乐复古气息,同时也强调雅乐文化的新发展。以复古为鹄的雅乐复兴成为近几年讨论热点。罗旻指出北宋士人在儒学复兴背景下总结与反思前代礼乐兴亡教训,力求取法三代并复兴周代礼乐与诗教传统,确立本朝雅乐规范;南宋为宣示正统,全面重整雅乐,律准遵循大晟乐,礼乐制度从仁宗朝之制。^⑬杨倩丽等指出北宋雅乐六次大规模改革主导思想含有“用乐以合《周

礼》”的成分,但始终未形成理想雅乐体系。^⑭汪子骁指出宋代处于雅乐发展承前启后时期,从北宋前期到后期先后进行了多次雅乐制作,改革依循的古制越发向上追溯,对理想的“雅”的追求也愈加执着,但改制多停留在制度制定层面,且疏漏严重;及至南宋,朝廷大大缩减宫廷音乐机构规模,直接从民间征调乐工,雅乐受重视程度下降。^⑮赵艺兰、杨成秀集中于大朝会乐制的变化,指出北宋大朝会基本继承前代框架,但用乐制度前后期变化较大,初期多承前朝,用乐雅俗并陈,中后期随着复古三代的政治文化取向增强,逐渐取缔初期用乐传统,专用雅乐。^⑯杨成秀研究更为具体,指出太宗淳化后全用雅乐已成常态,而且专门分析了自太祖到高宗大朝会礼用乐在“上寿仪”中的变迁。^⑰复古潮流下雅乐的新变也得到充分注意,路佳琳探讨北宋中期景祐—嘉祐年间在复兴儒学思潮影响下雅乐形式的变化,乐书方面制作出《景祐乐髓新经》《景祐广乐记》《钟律制议》等,乐器出现拱宸管、七弦琴、九弦琴等革新,雅乐机构在礼部、太常寺、大晟府外设临时议乐机构“详定大乐所”,专门讨论朝会及祭祀的乐律制度。^⑱崔萌指出大晟府出现后宫廷雅乐乐器种类增加,演出形式更加丰富多样。^⑲

一些研究者热衷于透视雅乐改制背后隐藏的政治博弈,虽偏重社会学视角,但对解析雅乐文化本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管艺指出雅乐在北宋朝堂呈现旷日持久争论,每次雅乐改制虽都围绕乐律调高问题展开,但士大夫关于音乐问题的博弈隐含着对政治话语权的争夺。^⑳于洋专题研究仁宗朝景祐—皇祐年间乐议现象,揭示士大夫阶层如何通过参与制礼作乐试图实现“共治天下”。^㉑胡劲茵则具体分析了仁宗景祐时期以“李照乐”为核心的乐制改革背后的政治权利争夺。^㉒徐蕊对北宋雅乐的中声音乐观与钟声实践的探讨也关涉相关问题。^㉓林萃青指出宋徽宗统治思想极重视以雅乐为重心的礼乐活动,追求雅乐与古制符合,最大限度发挥礼乐政治

功用。^㉔孙亚琼也探讨了宋徽宗雅乐改制的政治文化意蕴。^㉕还有研究者强调用比较研究视角更清晰揭示宋代雅乐特点及影响。孙琳比较唐宋雅乐的乐队、乐律、管理机构、雅乐制作、君臣对雅乐的态度,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等外部因素,从历史发展角度考察并概括出唐代雅乐尤简、宋代雅乐繁杂复古的特点。^㉖邱源媛也得出唐代雅乐求新、崇尚融合,宋代雅乐保守、寻求复古的结论,重点分析了宋代律吕制作的复古性。^㉗易霜泉整理两宋、辽、金宫廷吉礼音乐史料,研究吉礼用乐的纵向传承与变迁。^㉘

另外,宋代雅乐与东亚文化圈雅乐文化的关系也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主要原因在于东亚文化圈雅乐文化传承自中国,而且又成为国内雅乐复原活动最重要的活态参考资料。唐宋以降雅乐流布到东亚文化圈,经过漫长本土化过程,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继承并发展出本民族雅乐文化,其中古代朝鲜主要承袭宋代雅乐。自21世纪后国内学者开始热切关注朝鲜雅乐文化,一些学者偏重考察宋代雅乐传入朝鲜的情况。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指出高丽是唯一从中国吸收大晟乐的国家。^㉙韩国的徐海准等细致考证并梳理徽宗朝雅乐系统传入高丽朝的过程,以及雅乐形态的被接受情况。^㉚赵维平指出北宋政和年间将完整雅乐赠予朝鲜,认为朝鲜半岛现存雅乐是东亚所存唯一真正中国古代音乐形式的雅乐。^㉛更多学者关注朝鲜对宋代雅乐的接受、传承,进而不断衍变的历史状况。迟凤芝梳理高丽朝对宋朝雅乐的接受与雅乐在李朝宫廷乐中的传承与衍行,指出由宋朝流传到高丽朝的雅乐保持了宫廷仪礼乐和祭祀乐的属性,是标准雅乐,只在乐器和乐曲内容方面融入了朝鲜乐成分。^㉜陈妍慧历史梳理更为细致,指出高丽时期引进北宋大晟雅乐并保持其原本样态,高丽末期动乱,乐工、乐器散失,李朝重新恢复雅乐,考察儒家典籍,完成雅乐律管、乐器、乐谱制作,制定用律用乐规范和登歌、轩架、二舞形态。^㉝

迟风芝还专门具体考察朝鲜文庙雅乐的乐谱、乐器、乐队编制、乐律制度、雅乐形态、祭祀程序等,并辨析文庙雅乐对中国雅乐的具体承袭、改变之处,试图从中发现中国雅乐本貌。^③此外,刘青弋追溯至二战后,^④宫宏宇、王小盾也从音乐交流角度审视宋代雅乐传播。^⑤

综合考察宋代雅乐的历史研究,可以看到该研究领域重视系统完备的历史文献收集整理与精细的考证辨析,强调实证研究的严肃性。在研究路径上,一方面,视域开阔,试图从历史演进、艺术社会政治功能、文化交流等多维视角审视,但另一方面,研究话题较为集中,专题性强,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总体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二、宋代雅乐形态研究

宋代雅乐研究的另一个核心方向是雅乐的具体形态研究,相关成果不仅成为宋代雅乐历史研究最重要的音乐文化形态的佐证,而且也成为宋代雅乐复原研究与复原实践探索最直接的依据。国内学者在该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帮助我们超越纯粹历史文献研究的局限,获得了对于宋代雅乐文化更直观的感受。20世纪10—60年代的宋代雅乐研究的核心成果就是对于雅乐形态问题进行的初步历史文献分类梳理。萧友梅《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分为乐队和乐队乐器研究,简要梳理概括了宋代雅乐乐队情况,在介绍乐器形制时也涉及宋代。王光祈简要梳理古代雅乐乐队组织、舞乐形式等文献,涉及宋代雅乐的散见第三章《律之进化》、第四章《调之进化》,其中第四章引述《宋史·乐志》关于政和年间大晟雅乐补徵、角二调的记载。^⑥许之衡简要介绍了宋代雅乐的乐调、乐器、乐曲内容、乐队等情况。^⑦杨荫浏集大成,对宋代雅乐的应用场合、乐曲内容、乐曲创制,以及标题、乐律制度、乐器制作、表演形式等进行了系统文献梳理与概括总结。^⑧此外,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了陈梦家、李文信等对于现存大晟钟的精细考古学研究,^⑨日本林谦三《东亚

乐器考》也在1962年翻译出版^⑩。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研究沿袭着他们所开拓的问题域做出了更为专深的探索。关于宋代雅乐形态的研究以专题性的讨论为主,包括对于音乐、表演、乐队等方面的形态研究,另外,对于乐器的研究非常突出。这些研究活动仍然建立在坚实的文献整理、研究基础之上,而且文献整理工作较之开创期更为系统全面,同时,考古学成果极大地推进了对乐器的研究。

对于宋代雅乐形态的综合性研究极少,现有成果均是就某一仪式的“解剖麻雀”式的研究,如汪洋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宋代五礼仪式音乐的相关文献,分为五礼种类及典型仪礼用乐程式、五礼仪式音乐特征及乐队编制、五礼仪式音乐中典型乐曲和乐章三方面。^⑪杨成秀具体梳理了自宋太祖到宋高宗大朝会礼用乐在“上寿仪”中的用乐类型、仪式、乐章结构、音乐音高、乐队组合等方面的变迁。^⑫关于宋代雅乐的音乐形态研究,涉及音乐观念、乐歌、乐谱、乐曲等方面。关于雅乐的音乐观念研究,前文述及的有关雅乐发生与历史演进的研究成果中均对此有过细致探讨,其他专题性的研究还包括杨成秀对于北宋雅乐乐文献的系统梳理和对音乐观念的挖掘,^⑬徐蕊对于中声与钟声概念及其关系的讨论,^⑭以及孙亚琼对于宋徽宗音乐思想的研究等^⑮。在雅乐的乐歌研究方面,徐利华做出了综合系统的深入研究,其专著《宋代雅乐乐歌研究》^⑯在扎实的文献考据基础之上,从礼、乐两个维度透视乐歌,尤其是注重从仪式活动视角考察乐歌的生成、特质、形式等问题,如他指出宋代典礼仪式大多数环节是通过乐歌的变换推动仪式程序开展,并掌控仪式节奏。他还通过研究祭天、享祖、朝会等典礼中的仪式环节和雅乐乐歌的设置,勾勒出同一种典礼在不同时期仪式环节与乐歌演唱中的沿革。具体到乐歌创作,他说明乐歌创作者通过描绘仪式场景增强作品的现场性,而仪式场景特点直接影响乐歌意象生成。徐利华还专门探讨了雅乐的乐歌文体,指出众多雅乐乐歌是

宋代雅乐复兴的产物,乐歌创作复古而不泥于古,既有古雅一面,又深受诗词创作风气影响,体裁、格律有种种新变,文体选择也巧思独运。罗旻具体分析南宋高宗朝郊庙朝会乐歌制作情况,当时因典礼仪节愈趋繁琐,大晟乐章又多所散佚,所以广为新制歌辞,规模空前。^⑧关于宋代雅乐乐谱的研究,徐利华《宋代雅乐乐歌研究》附有对《中兴礼书》中雅乐乐谱的翻译。此外,林萃青专门探讨南宋宫廷祭祀音乐。^⑨

对于宋代雅乐的表演体制,康瑞军的专著《宋代宫廷制度研究》^⑩最具代表性。该书专设“宋代宫廷音乐表演体制及特质”一章考察宋初政和以来雅乐表演体制的演变,揭示出宋代雅乐在乐队规模、用乐场合,以及用乐程式等方面的变化,并依据《文献通考》与《政和五礼新仪》重新绘制了宫架示意图,力图修正杨荫浏所绘宫架示意图的不足。康瑞军还考察了宋代宫廷雅乐依托的仪节程式并归结其特点。关于宋代雅乐的乐队编制,张丽《宋代乐队编制研究》进行了专题研究,她依据《宋史·乐四》详细梳理了大晟府主持下的宫架乐、登歌乐的乐队规制情况,并绘制了亲祠宫架乐队、大祠宫架乐队、亲祠登歌乐队、大祠与中祠登歌乐队编制图表,指出徽宗时期的雅乐(新乐)乐队编制甚至成为后世历朝宫廷雅乐活动都必须借鉴的典范。^⑪

关于雅乐乐器研究方面的成果非常突出,研究者在现代考古学、声学、音律学等方法的帮助下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当然,较为传统的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成果依然占据主体。王秀萍《宋代乐器研究》通观宋代乐器整体状况,将宋代乐器分为击乐器、气乐器、弦乐器三大类,考证并描述各种乐器名称、形制、使用场合、演奏方法,以及各时期形态变化等,同时按照乐器使用场合说明雅部乐器基本情况。^⑫张春义针对大晟府雅乐乐器做出考据研究,指出大晟雅乐的乐器特点与以前宋代各时期的雅乐绝然不同,大晟雅乐乐器基本是刘昺正声、中声、清声

系统的乐器,虽依传统分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部,但删汰了“熊罴按”乐器(如箏、筑、阮、箏、拱宸管等),增置了景钟、簨等大晟乐器,清理了木部乐器的淆乱局面,还补充入“匏、土二音”。^⑬

对于大晟钟的研究尤为引人瞩目,现代考古学、声学、音律学等方法得到有效运用,主要围绕大晟黄钟等问题,出现了万依和李幼平等的重要成果。万依《宋代黄钟的改作及大晟黄钟的影响》基于对历史文献的精细考辨,从音律学、考古学角度出发,纵观由宋至清的乐律发展历史脉络,极为深入地探究了北宋徽宗朝黄钟的改作与大晟黄钟对后世历朝的深刻影响等。^⑭万依首先专业性地精细考证了北宋徽宗朝刘昺制作大晟乐律、改作黄钟的开创性贡献,指出刘昺未按古法以黍尺、候气、汉钱尺、景表尺等作依据并否定魏汉律乐,充分尊重历代乐工累世的音乐实践,允许乐工“随律调之”,综合制定出大家能够习惯并接受的乐律系统,以及黄钟音高,该音高和人的歌唱能力相适应,乃“中和之声”。其次,万依详细考证了自北宋后金、元、明、清各朝代宫廷音乐的黄钟音高,证实它们均受到了大晟乐律的决定性影响。此外,万依还考证确定大晟黄钟音高为“C”,力图纠正杨荫浏确定为“d”的结论。本文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典范性成果,将考古研究、文献考据与律学研究较好结合,具有很高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万依后来又专门解说了现存大晟钟的测音情况,说明根据现存古尺和文献记载综合推算大晟黄钟律管(即大晟乐尺的长度与内径)所做律管测音与故宫所藏黄钟清编钟测音相校相差甚微,其余几枚编钟测音结果也基本符合现代十二平均律,他因此得出了宋代音乐技术与铸造水平已达很高水平,并掌握了十二平均律的结论。^⑮李幼平的专著《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完全依据他在海内外查访的现存宋代大晟钟的实际音响来探讨宋代黄钟标准音高,并认定宋代新定并付诸音乐实践的黄钟标准音高可能只有北宋初期太常律、中后期教坊律和末期的大

晟律。^⑤此外,由于受到现代考古学、声学、音律学等学科方法的启示,李幼平在考察历史文献时,关注到科技进步对宋代雅乐的重要影响,提出随着宋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先秦编钟的科学钟体结构与发音原理被宋代科学家、音乐学家逐步认识,进而出现了改乐铸钟、以器写声、用钟记律的历史现象,这直接推进北宋编钟铸制与使用、历次黄钟标准音高变迁、新乐制定与推广等。^⑥李钊则从科技史角度对李幼平的论断做了更为细致的考察与分析。^⑦

综合考察宋代雅乐形态研究,可以看到该领域研究不仅强调建立在系统完备文献收集、整理与精细考证、辨析基础上的严谨的实证性研究,而且充分重视考古发现,并有效吸收现代考古学、声学、音律学等科学成果。因此,除了在系统整理宋代雅乐形态文献并进行分析、概括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之外,在对乐器的科学研究方面也出现了较大程度的突破,为雅乐乐器复原探索提供了一定的科学研究依据。

三、雅乐复原综合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热潮的兴起,包括宋代雅乐在内的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形态的复原(或称复建)问题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涉及乐器、乐歌、乐曲、乐舞、仪式音乐活动等的复原实践均进入逐渐探索中,复原研究与复原实践两者相互促进。

较之宋代雅乐历史研究、雅乐形态研究,雅乐复原研究尚处于初始探索阶段,所关注的核心问题除宋代雅乐乐器及音响复原之外,还有关于如何实施复原工作的路径与方法等。当然,对于后者的论述多是较为浮泛的概括,而且是在泛论所有的雅乐现象。不过,在这些讨论中有关复原工作的方法、原则等的设想对于宋代雅乐也是普遍适用的,可以为宋代雅乐的复原研究提供有效的方法论基础。方建军、赵维平、刘青弋的思考比较有代表性。方建军《有关雅乐重建的几个问题》思考雅乐重建较为全面,而且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价值。他指出雅乐重

建需要注意以下问题:其一,要为雅乐重建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对雅乐的研究要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并进行历时性考察;其二,要明确认识到雅乐的问题并非纯粹的音乐的问题,因为雅乐既是古代中国礼乐制度的核心组构,也是礼乐活动的主要载体;其三,要认识到雅乐重建最终是要以具体的表演形态呈现,因此,要立足于坚实的历史研究基础之上,并在制作材料、工艺技术等方面充分吸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⑧赵维平《中国与东亚诸国的雅乐及重建雅乐的思考》综合考察了中国及东亚各国雅乐的基本形态,试图归纳出中国雅乐的主要类型和演奏形态。赵维平指出如果要为雅乐的复建工作奠定良好的学术研究基础,除了要对文献史料、仪式制度、服饰舞容等音乐“外围”问题作出详细考察,更要对雅乐的乐器音律、乐器形制、演奏法、音响审美趣味等音乐本体的问题展开研究。^⑨刘青弋试图归结出以重建雅乐舞为鹄的学术研究的基本途径,并指出相关研究都要围绕为重建寻找依据而服务:其一,坚持历史学与考古学方法,返回原典,获得可靠的历史文献依据;其二,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等方法,寻找雅乐舞的活态遗存,即重建工作的活的依据;其三,社会学、符号学、语言学和艺术图像学结合,为阐释历史文献建立学术依据;其四,运用历史学、语言学、美学等方法,整理古典舞蹈“术语”,审视古典舞蹈历史面目。^⑩当然,刘青弋所持的是广义的雅乐观,即将狭义的雅乐与燕乐都包括在内。另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古代乐器复原的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如对曾侯乙编钟、新疆丝路沿线出土琵琶类乐器、贾湖骨笛的复原研究及复原实践都引人瞩目,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⑪这些研究成果,以及复原工作的相关思路与具体做法,均为宋代雅乐乐器的复原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

具体到宋代雅乐的复原研究领域,有关宋代雅乐乐器及音响复原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其中尤其显著的是李幼平对于大晟钟复原的研究。它包括两

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建立大晟钟复原的史料依据。首先,对于大晟钟进行严谨的历史文献学研究,确定了大晟钟演变的三个历史节点,即大晟钟成之时、大晟钟成之后出现一些变迁、靖康之变后出现流变;^③其次,借助现代考古学、声学、音律学等科学方法,依据他所寻访到的海内外现存的25件宋代大晟钟的实际测音数据,确定了宋代黄钟标准音高。^④第二部分,李幼平深入思考大晟钟复原的理论与方法,并为仿制试验做准备。他对于复原理论研究和实验性实践活动中的“复原”“复制”“仿制”“重制”等类型做出理论辨析与界定,并明确阐释了复原活动的本质特质,指出后人的复原只可能做到相对接近,而根本不可能完全恢复原貌,这是由复原工作的过程所决定的,因为复原工作首先是运用当前掌握的技术、方法、理论对于已知文献、已见文物进行科学研究,获得历史依据和科学依据,然后在此研究基础之上展开专题性、综合性历史原貌重构。此外,李幼平还具体论证了复原与复制大晟钟的四种基本路径,即全貌性复原、已知品复制、典型器复制、局部性复原与全景式示意。^⑤

宋代雅乐复原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方向是乐舞的复原研究,已作出了初步的尝试。杜心乐《北宋祭孔佾舞舞谱恢复考略》考证北宋祭孔佾舞有关的文献史料,提出采用明万历年间所编《阙里旧志》中收录的舞谱来恢复北宋祭孔佾舞。^⑥李荣有指出基础理论研究对于复建南宋雅乐舞的重要意义。^⑦刘青弋试图挖掘整理与复原中国宫廷舞蹈,和杭州师范大学合作复建南宋雅乐舞的项目,设想在历史文献研究基础上,研究复建南宋雅乐音乐代表作、乐器与舞蹈代表作,以及服饰、道具等,不过,她所坚持的雅乐概念较为泛化。^⑧

宋代雅乐复原的相关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与拓展,为宋代雅乐的复原实践积累了愈来愈多的历史依据与科学依据,这些均推动着复原实践活动的有效开展,进而催生出一系列重要的复原实践探索成

果。其中李幼平带领研究团队在对大晟钟的学术研究和复原研究基础之上进行仿制实验,并撰写报告,记录其对于大晟钟的复原理念、复原路径与仿制实验活动。如李幼平研究团队在《河南大晟钟及其复原研究与仿制实验》中完整记录了他们对开封、洛阳现存大晟钟的实验考古、复原研究、音乐音响试验、仿制实验等的全部过程。他们最终在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的帮助下,重新设计、仿制了一套中型大晟钟编钟,通高28cm,共16件,标准音高为A4=440Hz,音域则遵循大晟钟复原研究结论,按十二平均律取一个八度加小三度(增二度),范围在C4至#D5之间。^⑨李幼平研究团队还在《大晟钟的复原研究与仿(重)制试验》中历数了他们多年来所进行的大晟钟仿制工作的情况。这两篇报告对于仿制大晟钟的音高数据、形制数据,以及铸造工艺等都有极其细致的记录。可以看到,李幼平研究团队所完成的大晟钟的复制实验活动体现出客观严肃的学术研究与复原实践活动的较好结合,对于宋代雅乐的乐器复原实践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性意义。刘青弋研究团队尝试复制南宋雅乐乐队的全套乐器、复原7部南宋音乐作品,以及一些文舞、武舞。^⑩较之李幼平研究团队的复原工作,国内很多地区的各种复原宋代雅乐文化形态的尝试往往因缺乏客观严肃的长期学术研究而显得依据不足。

综合考察宋代雅乐复原综合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可以看到,较之宋代雅乐历史研究、雅乐形态研究领域而言,该领域研究仍显得较为薄弱,只是在大晟钟的复原研究和复原实践方面取得了较为坚实的实绩,而成绩的取得正是基于针对大晟钟的有效的科学考察与研究。对于大晟钟的复原研究和复原实践应该成为其他方面复原研究与实践的范例。

结语

综上所述,自民国初年开始迄今,国内宋代雅乐研究已逾百年,成绩斐然,尤其在进入21世纪之后,研究成果出现井喷现象,在宋代雅乐历史研究、雅乐

形态研究、雅乐复原综合研究等三个方向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均取得长足进步,并形成以下特点:首先,严格的历史研究与复原实践探索紧密结合,不仅使该领域历史研究成果带有潜在的实践性,而且使复原研究与复原实践具备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其次,二重证据法的有效运用。一方面,研究者遵循实证史学传统,在各自研究范围内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历史文献收集、整理与精细的考辨;另一方面,非常重视相关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并力求与文献研究紧密结合,为专题研究奠定了坚实实证基础。再次,充分吸纳科学成果与技术手段。一方面,充分吸收现代考古学、音律学等学科成果与方法;另一方面,纳入冶金学、金属工艺学、声学等学科的科技手段,推动了宋代雅乐理论研究与复原实践的突破性进展。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看到,国内的宋代雅乐研究领域仍存在着各种较为严重的问题,而且现有成果距离精准研究和原样复原的预定目标依然遥远。事实上,宋代雅乐研究领域是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的,这主要表现在研究根基的不牢固。很明显,关于宋代雅乐的历史文献留存不多,可供资证的出土文物极少,而作为活态存在的东亚文化圈的雅乐文化的参考价值实际十分有限,因为毕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些国家的雅乐文化已经充分地本土化、民族化,从中已经很难辨析出作为传承母体的中国古典雅乐的初始形态。这些使宋代雅乐研究在雅乐历史研究、雅乐形态研究、雅乐复原研究及实践等方面均面临着很大的难题。另外,国内宋代雅乐研究领域中的不少研究、复原等活动仍然不够严谨,不仅存在着对于诸多历史现象进行大胆推测与主观臆想的情况,而且将中国各时代的雅乐现象混淆、把东亚文化圈的雅乐现象与宋代雅乐混为一谈等情形亦时有发生,各地的复原实践活动更是较为混乱。这就要求研究者认真回顾百年来宋代雅乐研究的探索历程,并决意立足于更为严格的学

术研究的基础之上,继续拓宽新的思路,探索新的方法,发现新的方向,以期实现宋代雅乐研究的新的历史性的突破。

注释:

①萧友梅博士论文中文题名为《中国古代乐器考》,廖辅叔译,《音乐艺术》,1989年第2-4期。

②王光祈:《中国音乐史》,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

③许之衡:《中国音乐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④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北京:音乐出版社,1964年。

⑤林谦三著,钱稻孙译:《东亚乐器考》,北京:音乐出版社,1962年。钱稻孙依据的是作者初稿,与1973年日文版相差较大。

⑥文河渊,文钟祥著,柳修彰等译:《朝鲜音乐》,北京:音乐出版社,1962年。

⑦李方元:《〈宋史·乐志〉研究》,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

⑧杨成秀:《思想史视域下的北宋雅乐乐论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⑨发表成果包括李方元:《〈宋代乐论〉导论》,以及李方元,康瑞军,杨成秀:《〈宋代乐论〉辑录:论音乐生活》《〈宋代乐论〉辑录:论音乐展演》,《音乐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2018年第1、4期。

⑩卫亚浩:《宋代乐府制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⑪王小盾,李晓龙:《中国雅乐史上的周世宗:兼论雅乐的意义和功能》,《中国音乐学》,2015年第2期。

⑫郑月平:《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⑬罗旻:《宋代雅乐复兴与郊庙朝会乐歌制作》,《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⑭杨倩丽,陈乐保:《用乐以合〈周礼〉:试论北宋宫廷雅乐改革》,《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⑮汪子骁:《两宋雅乐研究:以雅乐发展趋势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⑯赵芝兰:《北宋中后期大朝会乐制的雅正化进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①杨成秀:《宋代大朝会礼用乐及其变迁研究》,《音乐艺术》,2019年第2期。

②路佳琳:《北宋景祐:嘉祐年间的雅乐研究》,杭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③崔萌:《大晟府对宋代音乐文化的影响》,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④管艺:《六次乐改中的音乐话语与政治博弈》,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⑤于洋:《乐与政通:北宋中期的乐议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⑥胡劲茵:《乐制改革所见北宋景祐政治》,《史学月刊》,2016年第12期。

⑦徐蕊:《中声与钟声:北宋雅乐的中声音乐观与钟声实践》,《中国音乐学》,2013年第4期。

⑧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

⑨孙亚琼:《宋徽宗音乐思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⑩孙琳:《唐宋宫廷雅乐比较研究》,武汉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⑪邱源媛:《唐宋雅乐的对比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⑫易霜泉:《两宋、辽、金宫廷吉礼用乐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⑬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⑭徐海准,陈真:《朝鲜半岛高丽时期的宫廷仪式音乐研究》,《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⑮赵维平:《朝鲜李朝时期雅乐的历史变迁》,《音乐研究》,2015年第5期。

⑯迟凤芝:《朝鲜半岛对中国雅乐接受、传承与变衍》,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⑰陈妍慧:《北宋大晟雅乐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衍变》,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⑱迟凤芝:《朝鲜文庙雅乐的传承与变迁》,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⑲刘青弋:《中国古典舞代表作重建的探索与思考》,《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⑳宫宏宇:《赵估的音乐外交与宋代音乐之东传:介绍英国学者普兰特对宋代中国与高丽间音乐交往的有关研究》,《黄钟》,2001年第2期;王小盾:《从〈高丽史·乐志〉“唐乐”看宋代音乐》,《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1期。

㉑王光祈:《中国音乐史》,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

㉒许之衡:《中国音乐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㉓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北京:音乐出版社,1964年。

㉔李文信:《上京款大晟南吕编钟》,《文物》,1963年第5期;陈梦家:《宋大晟编钟考述》,《文物》,1964年第2期。

㉕林谦三著,钱稻孙,等译:《东亚乐器考》,北京:音乐出版社,1962年。

㉖汪洋:《宋代五礼仪式音乐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㉗杨成秀:《宋代大朝会礼用乐及其变迁研究》,《音乐艺术》,2019年第2期。

㉘杨成秀:《思想史视域下的北宋雅乐乐论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㉙徐蕊:《中声与钟声:北宋雅乐的中声音乐观与钟声实践》,《中国音乐学》,2013年第4期。

㉚孙亚琼:《宋徽宗音乐思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㉛徐利华:《宋代雅乐乐歌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㉜罗旻:《宋代雅乐复兴与郊庙朝会乐歌制作》,《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㉝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

㉞康瑞军:《宋代宫廷制度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㉟张丽:《宋代乐队编制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㊱王秀萍:《宋代乐器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㊲张春义:《大晟府雅乐乐器考》,《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㊳万依:《宋代黄钟的改作及大晟黄钟的影响》,《音乐研究》,1993年第2期。

⑤万依:《一朝大晟钟 余音八百年》,《紫禁城》,1998年第8期。

⑥李幼平:《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

⑦李幼平:《宋代新乐与编钟》,《黄钟》,2001年第1期。

⑧李钊:《科技的部分领域对北宋音乐的影响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⑨方建军:《有关雅乐重建的几个问题》,《天籁》,2011年第2期。

⑩赵维平:《中国与东亚诸国的雅乐及重建雅乐的思考》,《中国音乐》,2011年第2期。

⑪刘青弋:《中国古典舞代表作重建的探索与思考》,《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⑫代表成果如王子初:《复原曾侯乙编钟及其设计理念》,《中国音乐》,2012年第4期;黄翔鹏:《舞阳贾湖骨笛的测音研究》,《文物》,1989年第1期;张寅:《古乐器音响复原及相关概念的讨论》,《人民音乐》,2013年第9期;吴春艳,张寅:《新疆丝路沿线出土琵琶类乐器及其音响复原构想》,《音乐研究》,

2016年第3期;孙毅:《舞阳贾湖骨笛音响复原研究》,《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4期。

⑬李幼平:《大晟钟的复原研究与仿(重)制试验》,《黄钟》,2015年第4期。

⑭李幼平:《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

⑮李幼平:《大晟钟的复原研究与仿(重)制试验》,《黄钟》,2015年第4期。

⑯杜心乐:《北宋祭孔佾舞舞谱恢复考略》,《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⑰李荣有:《南宋乐舞艺术现代复建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⑱刘青弋:《中国古典舞代表作重建的探索与思考》,《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⑲李幼平:《河南大晟钟及其复原研究与仿制实验》,《中国音乐》,2014年第4期。

⑳刘青弋:《中国古典舞代表作重建的探索与思考》,《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Comprehensive Study of Elegant Music in the Song Dynasty

Chen Zonghua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Song Dynasty's Elegant music in China began at the beginning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10th-60th of the 20th century opened up the basic path and direction of the study of the Song Dynasty's elegant music in China. Since the 90s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movement of domestic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started the restoration exploration of the Song Dynasty's elegant music.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work and the restoration practice exploration have started to go hand in hand. The research of elegant music in the Song Dynasty has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Elegant music, the research of the form of Elegant music and th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f the restoration of Elegant music. I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systematic arrangement and careful examination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emphasiz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examination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 social function of art,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he field of morphology research is based on strict empirical research, pays full attention to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absorbs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such as modern archaeology, acoustics, and phonology, making effective breakthroughs in musical instrument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comprehensive restoration research,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on Dasheng Bell,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restoration research and restoration practice. A Centennial Study of Elegant music in Song Dynasty has form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ose combination of history research and restoration practice exploration, application of dual evidence law, and full absorption of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and technical means.

Key words: elegant music in the Song Dynasty; history of elegant music; form of elegant music; musical instruments of elegant music; restoration of elegant music